



看书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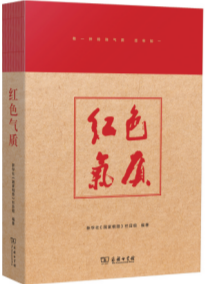
以轻松诙谐笔触诉说人生百味



《悠悠我心》全书共分为四章。“议古·论今”“历史·地理”两章中，作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地理、历史、文化、人物与现代中国的渊源和关系，亦有对社会热点的理性思考。

本书穿行在理论与现实间，既有对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的观察和思考，讲述读书治学的独到体悟；亦有对社会热点的理性分析，展现一代学人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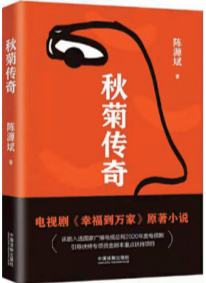
光影中的百年红色精神气质



《红色气质》从《国家相册》已播节目中，精选出一组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侧面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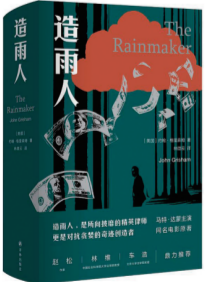
作为新华社精心打造的品牌栏目，《国家相册》带着镜头走进中国照片档案馆，结合影像和特效，细述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

关于“讨个说法”的传奇故事



《秋菊传奇》讲述的是村妇何碧秋与村主任发生争执后被踢中要害，何碧秋为“讨个说法”将村主任告到乡、县、市公安局，再起诉至法院，最终获胜。

如何选择自己的造雨人生



《造雨人》是马特·达蒙主演同名经典电影原著。书中讲述了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律师扳倒一家大公司的故事。

“造雨人”是一个精妙的比喻。因为掌握了法律的技术，一名法律人就变身为一位有可能呼风唤雨的巫师。



法治道路的中国经验及其世界意义

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书林臧否

徐汉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一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汪业根教授组织全国该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人员通过7年的潜心研究而完成的。

新命题和新结论，在重新类型化世界法治模式及其中国意义的前提下，科学解析了中国法治道路“一元两面三层四维”的内在构造。

为了实现在法治道路探索上的对话互鉴，该书系统梳理了八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国家法治道路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路置于全球法治实践，为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统筹，进而提升中国法治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交流对话的知识储备。

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的纵深发展，该书从三个层面——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深入探究了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进了国家制度的创新发展；在“法治理论篇”中，从良法善治论、法律权威论、权利保障论、权力制约论、社会公平论、司法正义论、法治信仰论、法治思维论、法治改革论和法治话语论共十个方面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原发性贡献。

为了增强法治道路的实践特性，该书概括提炼出了中国法治道路的实践模式——包容型法治实施模式。在“实践构建篇”中，创构出“中国版本”的法治道路运行模式及其实践之道。

宋朝的“职业法官”

法学洞见

殷啸虎

在中国古代，法官是一种职务而非“职业”。因此，在中国古代的选官任官制度下，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职业法官。

宋朝称得上是“职业法官”的，当首推北宋的陈大猷。他进士出身，为大理寺详断官，后又任刑院议法官，权大理少卿。

苦，岂不甚于我也”。他也曾出任过兖州、明州等地的知州，所到之处都有“治迹”。

与陈大猷经历相似的，还有苏某、杜絃、韩晋卿等人。苏某进士及第后，任兖州观察推官，后为大理详断官、刑院议法官、御史台推直官等。

杜絃进士及第后，担任永年县知县。宋神宗听说他很有才干，任命他为大理寺详断官，检详枢密院刑房，开启了他的法官生涯。

就同未婚夫订婚，到夫家做童养媳，但并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后未婚夫将她杀死以诬陷别人，案发后，在如何认定两人的身份关系上发生了争论。

韩晋卿历任安肃军司法参军、大理寺详断官、刑院议法官以及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卿等司法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职业法官”群体中，有一些是通过“明法科”和“试刑法”等与司法相关的考试成为法官的。

王吉甫等。崔台符是明法科出身，为大理寺详断官，后历任判大理寺、知刑院、以及大理卿、刑部侍郎等，长期担任中央司法机关长官。

在通过司法考试成为职业法官的人中，许遵可以说是争议最大的一个。他进士及第后，“又中明法”，任大理寺详断官，后又为刑院议法官。

南宋的“职业法官”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概要算是王衣衣了。他以门荫入仕，中明法科，历任深、冀二州法曹掾，入大理评事，升大理寺正。

器物逾制案 东土大唐奢华美器从何而来



图为唐代伎乐纹八棱金杯。

史海钩沉

胡艺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来春风”，李白鲜衣怒马、豪气干云的形象跃然纸上。

诸营造舍宅、车服、器物及坟冢、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虽会赦，皆令改之。

唯坟不改……若有犯者，并同此坐。其物可卖者，听卖。若经赦后百日，不改去及不卖者，论如律。

在金银器的使用方面，一品以下的官员不得使用纯金、纯玉制作的食器，如果违反规定，杖责一百。

贞观十年(636年)，彭王李元则“坐章服奢僭免官”，因为衣服逾制被免除了遂州都督。

提到大唐，我们往往会和盛世气象联系在一起，而精美的金银器具的日常使用，正是大唐人民生活富足的具体体现。

第二阶段：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经过前一阶段的学习实践，摆脱了西方的风格和模式，展现出盛唐的文化风貌。

异的金银器通过赏赐流入官员家庭，对于唐代的奢侈消费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用律令的形式加以禁止也是统治者防微杜渐，防止奢侈攀比之风蔓延的必然选择。

在唐代，没有哪类物品像金银器那样造型别致、纹样丰富、工艺精巧。匠人们在金银器制作上倾注的热情和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对其他物品的投入。

1970年，陕西安南何家村窖藏文物共出土金银器皿200多件，为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一阶段：7世纪至8世纪初，国内稳定，西域都护府等机构的设立使中西交通繁荣，包括金银器在内的西方器物大量传入。

第三阶段：9世纪，随着藩镇割据加剧，金银

器制造业从官制慢慢发展为私营，增加了金银器的实用性，形制趋于简洁，纹样更加随意。

唐代金银器的艺术风格肯定与粟特、萨珊、拜占庭这三个地区的影响分不开。除此之外，包括贵霜、嚈哒、大食等地在内，都应被列入影响唐代金银器特征的外来因素。

粟特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特性、历史因素，成为唐代东西交通的枢纽，这就意味着粟特在影响唐代的外来因素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粟特人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一带。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

西方文化的引入，为唐代的金银器带来了新的纹样、器形、工艺技术等。但是唐代的金银器制造工艺没有被束缚在西方的金银器制造思路中。

《文章节选自胡艺《案卷里的唐朝法律故事》，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